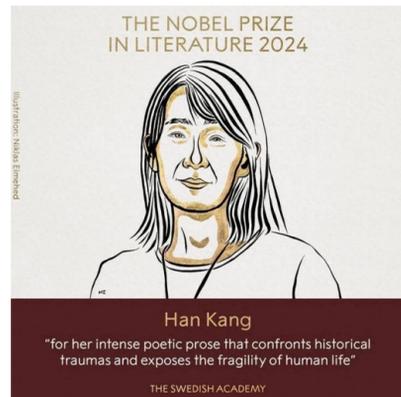


聚焦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

韩江:从布克国际文学奖到诺贝尔文学奖

□王敬慧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70后”的韩国女作家韩江(Han Kang)，“以表彰她用极具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一位作家，而非一部作品，但是读者还是不想起韩江那本深具冲击力的文学作品《素食者》(The Vegetarian)，该书英文版获得了2016年度的布克国际文学奖。本文将从翻译在韩江作品中的作用、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变化以及对未来诺奖的期待三个角度，探讨韩江如何从布克国际文学奖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

翻译在文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韩江的文学成就离不开翻译在其作品传播中的关键作用。2004年，她的《素食者》在韩国首次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非常平凡的韩国女子英惠(Yeong-hye)决定成为素食者，因为她渴望成为一棵树。而这一决定引发周围人不同的反应，有丈夫和父亲的虐待与谩骂，也有姐夫的痴迷。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女性内心压抑的疯狂与伤痛。2015年1月，该小说由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翻译为英文出版，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热烈讨论。该译者毕业于剑桥大学，除了《素食者》，她还翻译了韩江的《白》等多部作品。正是翻译所搭建的这一座文化桥梁，使韩江作品中蕴含的复杂情感、心理冲突及独特的叙事手法得以超越语言的障碍，触达世界各地的读者。

布克奖尤其重视翻译作品，所以从2016年

开始，专门设立了布克国际文学奖，以评选出被翻译为英文的优秀文学作品。韩江作品的获奖便是亚洲文学翻译崛起的鲜明体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在韩江的作品中，许多亚洲文化特定的意象、情感和哲思通过翻译被精妙地传达给异国的读者，增强了作品的普适性。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博伊德·唐金(Boyd Tonkin)就肯定译者的作用，认为译者与作者平分5万英镑的奖金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本古怪又睿智的小说在英语的版本中绝对表达出了原汁原味”。此实例说明，翻译文学不再是文学的边缘部分，而是推动世界文学交流的核心力量之一。而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对翻译文学的关注，也表明了当代文学通过翻译走向全球化的趋势。

韩江等非英语创作文本在国际文学奖项中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属于她个人，也属于全球文学中众多致力于翻译的无名英雄。正是因为翻译者的努力，使得韩江这样深具地方特色的作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对韩江的授奖，进一步肯定了翻译在当代文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变化

韩江的获奖，也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变化。过去，诺贝尔文学奖更倾向于奖励作家一生的文学成就，而布克国际文学奖则注重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突出表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逐渐从强调“终身成就”转

向关注“当代影响力”。

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名单，传统上它都会表彰作家一生的贡献，许多获奖者在获奖时已经有了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然而，1970年出生的韩江在获奖时的年龄相对年轻，且她的获奖作品更直接反映了世界性的社会复杂化。韩江的关注点不仅仅是韩国妇女，她具有世界性的视野，比如她的作品《白》反映的是波兰在二战中的历史创伤。这位作家擅长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心理深度，将个体在社会规范下的反抗与精神崩溃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主题与现代社会中关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压力的讨论非常容易产生强烈共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作品的关注也从表彰“终身成就”转向了与当代社会相关的问题，尤其重视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责任感。2018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2021年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便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例子。他们的作品探讨全球化、移民、历史创伤等话题，这些问题与现代读者的体验息息相关。稍微早时期的托妮·莫里森、露易丝·格丽克等作家都通过作品探讨了性别、种族、身份等议题。韩江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同样展现了她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力量。《素食者》通过个体对食肉社会的拒绝，揭示了身体与权力、自由与禁锢之间的矛盾。这种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使她的作品超越了文学的美学层面，成为社会流行话题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江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对社会压迫的反思和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展现了作家作为社会发声者的角色。她的作品同样切中现代读者的情感和心理困境，展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当下世界范议题的敏感度。

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重视全球视野，这也是韩江获奖的背景之一。过去，诺奖得主多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作家，而近年来，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作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韩江的作品虽然带有强烈的韩国文化背景，但通过普遍的主题，如精神压迫、家庭关系等，赢得了国际读者的共鸣。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也日益表现出对跨界和多样文体的接纳。韩江的作品既有小说的叙事特质，又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元素，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类界限。她的作品特别注重感受，比如她曾说：“我想要将鲜明的感觉——触觉、听觉和视觉——都传递出来，我将这些感受融入我的句子中，就像是电流。”这种文学形式上的突破，反映了她对社会心理的深刻洞察。类似的例子还有2016年，鲍勃·迪伦凭借其音乐歌词的文学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决定让当时的人们重新审视文学的定义。他们的获奖都显示了评委们对新形式和新叙事手法的包容与肯定。

对未来诺奖的展望

韩江的获奖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新的标杆。随着评选风向标的变化，未来的诺奖得主或许将更多地来自于非西方国家，且他们的作品将更侧重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困境。未来的诺奖得主也许不再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而是可以凭借几部重要

作品和突出的文学创新性赢得全球关注。文学不再局限于书本或某一特定的文化圈，而是成为全球范围内思想与情感交流的桥梁。

当下，动物权利研究专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正在中国进行一系列演讲，结合他著名的动物伦理著作《动物解放》最新版本中的核心理念，强调人类应学着感受到动物的痛苦。虽然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著名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动物是否能够推理或说话，而是它们是否能够感受痛苦。”这个问题为动物权利理论奠定了道德基础，但是在当代，随着文学与伦理学的融合，我们发现边沁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重要的不仅是动物是否能够感受痛苦，而是我们人类是否能够感知动物的痛苦，还有我们人类是否能够感受到所有他者的痛苦。”韩江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关键原因是她的作品通过叙事和情感塑造，使读者能够真切体验到他者的痛苦，甚至能够对跨物种的痛苦产生同理心。可见，通过文学，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彼此之间的痛苦，还可以将这种同理心延展到其他生命形式。

追溯韩江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她的作品通过翻译走向世界，代表了当代文学全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她的获奖，不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对当代文学创新、社会责任感以及跨文化对话的肯定。让我们期待未来文学及文学奖继续这样的趋势，为跨文化理解和人类共情做出贡献，让世界文学成为沟通不同文化与生命形式的纽带。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苏万康·塔玛冯萨《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

K的静默，真实的痛与笑

□岳剑锋

老挝裔加拿大女诗人兼作家苏万康·塔玛冯萨(Souvankham Thammavongsa, 1978-)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How to Pronounce Knife)的汉译本近期问世。英文版在2020年出版之初就斩获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吉勒文学奖和安大略崔胤图书奖等，并获得《时代》和《纽约客》等杂志的极力推荐。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由14个独立但内部相勾连的故事组成，故事最直接的灵感来源就是塔玛冯萨的生活体验和观察，塔玛冯萨的父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挝“秘密战争”的幸存者，1978年塔玛冯萨出生在泰国廊开的难民营。移民加拿大的老挝难民的多重社会身份构成了小说集的叙事空间和故事背景——他们是做着一份没人想做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他们是逃离故乡的离散者，他们是破碎家庭和社区的创伤受害者，他们是加拿大主流英语社会的边缘者。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家浓缩了移民作家观察到的属于当下的议题：作为文化身份的语言(如《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作为生存方式的工作(如《巴黎》与《美甲美甲》)和作为“他者”的移民女性(如《吱嘎——》与《昆虫》)。

“K的静默”

除了光彩耀人的奖项和流光溢彩的褒奖之词，这本薄薄的集子最让中国读者好奇的或许是一——中文译名和英文的不对等，“如何读刀”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刀”在英语中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单词。

本书开篇的同名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讲述了一年级老挝女孩乔伊和英语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因为妈妈不认识英语，每次都把老师通知班级活动的纸条直接扔进垃圾桶，让穿着绿色运动服的乔伊在穿着亮闪闪的粉色的同学面前难堪(作家个人网站首页的童年照片同样穿着绿色衣服)；唯一识字的爸爸也不知道knife这个单词中的k是不发音的，念道“卡耐夫”，读错knife让乔伊成为班里唯一一个没拿过奖的学生，“一双蓝眼睛，鼻子周围长着点点雀斑”的黄发女孩取笑了她，翻了个白眼，拿走了老师的红色悠悠球奖品。在少数族裔文学中，二代移民往往想通过流利的英语融入社区和主流文化，而一代移民希望维系住和母语之“根”的联系。比如在《喜福会》中，二代移民女儿吴菁妹说着流利的英语，一代移民母亲吴凤凰的英语支离破碎，是母女文化隔阂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段取材于塔玛冯萨童年经历的情节为我们指出了“语言即力量”之外的另一层内涵：为什么英语的力

量一定就是更强大的?和《喜福会》这样的20世纪少数族裔女性小说不同的是，一年级女孩没有以父母尴尬和破碎的英语为耻，而是坚持认为她父亲的发音是正确的。

塔玛冯萨解释道：“这个小小的单词‘刀’变成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东西的象征。这变成了一种尊重她的家庭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当这个小女孩和她的老师争论k的发音时，她不仅仅是难以相处，她是在为自己经验的有效性和家庭的完整性而战。”这里，作家给了读者多重“沉默”的并置与冲击，一是单词knife中k的不发音；二是“读了一辈子书、受了一辈子良好教育”但在加拿大不得不沉默的父亲，以及无法阅读英语只会扔掉纸条的母亲，对于塔玛冯萨而言，沉默是常态，“别告诉别人，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老挝人。告诉别人你是从哪儿来的没好处”；三是女孩乔伊的沉默，在了解真相后，断定不告诉父亲k是不发音的现实。在故事结尾处，乔伊把老师蔡小姐奖励的拼图飞机分享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很高兴，“因为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赢得的”。最后一刻，堆叠的沉默与累积的痛苦在真实的微笑与喜悦面前崩解，留白之际仿佛生命缝隙中透出的光，“后来，他们填充出完整的画面”。

真实的痛与笑

此外，封底上作家的一段话也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对我来说，笑并不轻松，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当事情令人难以忍受时，笑，不舒服的时候，笑。没有其他感觉的时候，笑。在快乐的时候也要笑。你必须笑，因为这是你夺回力量的方式。”

相信大部分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里不禁想问：你在笑什么?作家的这段话出自于《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访谈“作为盾牌的笑”(Laughter as a Shield)。塔玛冯萨在访谈后这样解释她的用意：“从痛苦中获得幽默，并让两者在同一时刻共存，这是我作为移民的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幽默似乎打开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一种重新获得的抵抗力或空间……他把笑声当作盾牌，这样他所谈的经历



苏万康·塔玛冯萨

就不会摧毁他。我想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换言之，塔玛冯萨想要笑着讲述痛的故事，而作家所呈现的各类“作为盾牌的笑”也可以理解为对种种真实的“作为生存体验的痛”的抵抗——故土离散、文化无根、边缘化生存与创伤的代际传递。

第八篇短篇小说《世界之涯》(“Edge of the World”)将视野转向了处在世界“边缘”的老挝难民的家庭和社区，在寥寥数页中感受“边缘”与“中心”的切换与激荡。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处在英语世界“边缘”的老挝家庭，父亲不让孩子在外面说老挝语，但在英语世界，父亲即是边缘，他这样描述工作中英语的压迫：“他们一个个英语说得飞快，一天到晚朝我大吼大叫，让我跟不上，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活得没个人样。”但到了老挝难民的聚会上，父亲却成为了难民社区的“中心”，讲大家听了一次次却不厌其烦的“遵命，先生”的故事：

他告诉他们，每当工作中有人让他干什么的时候，他都用英语回以“遵命，先生!”，但他是用“去你妈的”的语调和狠劲儿说的。然后他绕着屋子大步行进，像个尽职尽责的士兵向每个人敬礼，每次都用英语说：“遵命，先生!遵命，先生!遵命，先生!”讲到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多么礼貌，

多么和善，他乐得放声大笑。

一次次带着“去你妈的”的语调和狠劲儿的“遵命，先生”是社会边缘的老挝难民对英语苦涩、无奈和愤怒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塔玛冯萨以一种标志性的诗意的和自相矛盾的表达，比如老挝难民聚会上“一整晚笑声不断——一阵阵伤感、微弱的气流迸发”，所呈现的黑色幽默或是笑中带泪的呐喊，是“边缘”群体对抗存在真实之荒谬的盾牌。

如果说父亲代表着加拿大社会的“边缘”和老挝难民社会“中心”的并置与颠覆，母亲和孩子则代表了家庭的“边缘”和“中心”的错位与混乱。缺乏社会经验的母亲无知、沉默且缺乏安全感，她通过看肥皂剧学英语，她为聚会准备食物但不说话，她总是怀疑父亲在外偷情，她甚至坚信地球是平的。在塔玛冯萨的叙事中，母亲更像是需要照料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却不得不被职业化。母亲好像在女儿面前才能做自己，她在丈夫面前捂嘴笑，在女儿面前才能发出响亮而奔放的笑声；母亲向女儿索取安全感和归属感，刚上学的女儿给二十四岁的母亲读故事，安抚从噩梦中惊醒的母亲，为母亲盖上毯子，并告诉母亲：“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单的”。当女儿有一天发现“我们

是不同的人”，母亲懂的是“平的世界”所代表的战争、炸弹和死亡，而女儿生活在“圆的世界”，母亲和这个家庭的最后联系也被切断，在一天夜里拖着行李箱离开，让“如今四十五岁(的女儿)依然是个孩子，为她的离去而悲痛，一次又一次”。母亲的离开是她对“边缘”最后的反抗，被迫承担起“中心”的女儿只能感受到无力与绝望，幼小的自己努力照料的母亲“不仅离开了我，而且永远离开了我”。

在故事结尾处，女儿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发出了母亲一样的“响亮而奔放的笑声”，并提出了一个深刻而痛楚的问题——什么能让一个女人在此时的深夜放声大笑?是母亲离去不可弥合的创伤，还是成为难民时就用完的这辈子的悲痛?塔玛冯萨没有回答。在这里，我想到塔玛冯萨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分的解释或许能提供一些启发：“短篇小说能给你小说能给你的任何东西，但它不会占用你的时间。”塔玛冯萨短篇小说中拥有长篇叙事的张力，诗歌般真实而凌厉的情感，这些都是读者思绪漫游空间的来源。

从美国的讯息到英国的埃夫里斯托，英语文学中少数族裔的书写，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似乎总是和跨国迁徙、原生家庭、母女关系以及代际创伤等母题绑定，往往以个人维度的微小切口进入，缺乏“男性主流式”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宏大话题的恢宏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塔玛冯萨也未能跳出俗套，《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的十四篇小说都在讲述加拿大老挝移民的平凡乃至卑微的挣扎——如何在异国艰苦地寻求生存的确认，绝大部分人物和情节来自于作家的生活体验。

对于这种“约定俗成”，塔玛冯萨说道：“当我们在新闻和文学作品中遇到难民和移民时，他们往往是悲伤和悲惨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不想淡化它。但这也是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是谁的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我们不会经常看到自己是凶残的、愤怒的、忘恩负义的、快乐的、迷恋的。我真的很想说一些其他不太熟悉的经历。我想试着把这些感受想象成故事，并把它们与许多悲伤和愤怒的故事放在一起，形成一幅更复杂的画面。”塔玛冯萨努力将情感的厚度和人性的温度赋予“扁平化”的少数族裔标签式人物，“痛苦”的移民和难民也可以是且应该是血肉有肉的故事的主人公，社会的主心骨以及人生的主宰者。在塔玛冯萨笔下，真实的分量要超过对销量的考量，笑和痛凝结了人性的最真实的脆弱和完美，让一颗颗因创伤而陈旧的心被更多的人看到、感受、理解与共情。

(作者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